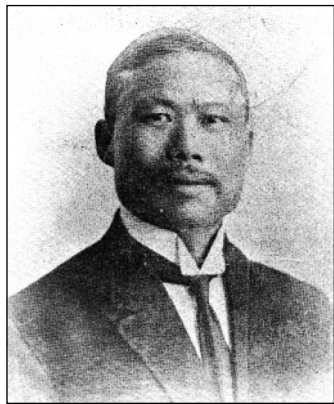


游美学务处、游美肄业馆、 清华学堂和清华学校

○唐绍明（1952 经济）

编者按：游美学务处、游美肄业馆、清华学堂和清华学校是清华建校前后的几个重要阶段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各类文献对于建校时期的历史事件说法不一。国家图书馆原副馆长、1952 级经济系唐绍明老学长对这一时期的史料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和梳理，出版了专著《清华校长唐国安》，对清华大学校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本刊转载《清华校长唐国安》的有关章节（略有删节），以飨读者。题目和标题由编者所加。



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国安

一、游美学务处

1908 年 7 月，中美双方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事项达成协议：将超收部分 1100 余万美元退还中国，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；确定从赔款开始退还之年起，头四年每年派遣赴美留学生 100 名，从第五年起每年派遣至少 50 名，直至该项赔款用完为止。协议由外务大臣唐绍仪和美国公使柔克义谈妥，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草拟照会文本，经庆亲王奕劻批准。7 月 14 日中美双方互换照会。10 月 31 日，袁世凯主持制定《派遣美国留学生的章程草案》（又名《计划草案》）。12 月 28 日，罗斯福总统颁布“实施法令”，宣布该项退款从 19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按照协议，当务之急是要设立一个

专司此事的机构——游美学务处（英文名为 China Educational Bureau to the U.S.）一如三十多年前容闳率学生出洋留学时成立的“出洋肄业局”（英文名为 China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.S.），不同处一个叫 Bureau“处”，一个叫 Mission“局”。

由于留学工作既属教育又涉及外交，应属双重领导，就规定由当时的学部（即教育部）和外务部各派出一人兼任领导，由外务部牵头。由于这是清廷主办的官费生出国留学，去的地方又是国势强盛的美国，所遴选的游美学务处领导人在资格上自然不能马虎，起码应是“丞参”之类，相当于今天的厅局级。

外务部首先推举左丞参周自齐，由他

兼任游美学务处的“总办”，即总负责人。周自齐也是留美生，归国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，不久前才从驻美使馆参赞任上调回外务部任左丞参，曾参与庚款留学谈判，由他兼任总办自然恰当。外务部向学部征询意见，大学士、学部尚书张之洞于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复函外务部表示同意，认为“各派总办一人，秉承两部门堂官，会同办理此事，较为灵捷”，并且指出“既派总办二员，自毋庸再派会办，拟改设为书记官或文案二员，专司办理华英文牍”。学部也准备推举一位丞参杨熊祥兼任总办，由此构成“两部两总办”领导游美学务处的双重领导格局。

但是，外务部又考虑到周自齐工作太忙，出访任务繁重，前曾陪载洵贝勒出访日本，不久还将陪载振贝勒出访英国，学务处方面的事恐难分身兼顾，就又提出改派外务部候补主事、从五品官唐国安替换周自齐，兼任总办。外务部领导层多为归国留学生，思想框框较少，且对留学情况比较了解，对唐国安的才识比较认可，于是做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变更，在收到张之洞函次日，即宣统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致函张之洞，内称：

“外务部现有要事交周参议承办，游学事极繁琐，一时恐难兼顾，拟改派本部后补主事唐国安为总办，与学部所派杨郎中商同办理一切。除备文咨达外，谨肃函本奉阅。”

张之洞收函后，考虑到外务部的困难，但又不愿降低总办规格，就又想起为总办配备会办的必要。所谓“会办”就是“会同办理”的意思，相当于副职。可考虑唐国安任会办。当即在次日，即宣统元年六

月二十五日复函外务部磋商，内称：

“游美学务处关系甚重，总办一差尤为紧要，仍以借重周参议长才充当此差，以资表率……如因周参议交涉事繁，可否两部各添派会办一员，以资赞助，贵部即可派唐主事国安为会办，敝衙门亦即另派会办一员，会同办理。”

嗣后，可能出于层叠过多的考虑，学部又和外务部“详加商酌”，提出由周自齐兼任学部丞参上行走的意见，上奏皇上请准。这是参照邮传部丞参梁士诒兼任外务部丞参的先例而提出的。学部在宣统元年七月初八致外务部函内称：

“拟援梁士诒成案，吁请天恩，将该参议周自齐兼派臣部丞参上行走，于学务外交均有裨益。如蒙俞允，由臣部行知该员遵照。”

最后，由外务部周自齐兼总办，唐国安兼会办，再由学部授予周自齐一个同级丞参的“上行走”官职，代表学部来领导学务处，学部另派一位会办，由员外郎范源濂兼任，如此“一总二会”的游美学务处领导班子搭成。（以上据清华大学校史档案）

宣统二年二月初一（1909年3月11日）《外务部递片奏折》将此方案上奏皇上。朱批：“知道了，钦此。”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：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》（一），第7～8页，《外务部递片奏折》）

早期庚款留美幼童生、后台湾工商业巨子胡光麇写书称，“周、范、唐三公搭配得非常恰当”。（胡光麇：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》，第76页）

由是游美学务处于宣统元年（1909）七月正式成立。同时确定，周自齐和范

□ 史料一页

源濂在游美学务处支半薪，每月分别领取250两和200两薪金，唐国安支全薪，每月400两。这表明他是全职会办，学务处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。胡光廙说，唐国安“长川驻校办公”，叫“坐办”（指“坐堂办公”）。清华学堂校医博尔特（Richard A. Bolt）曾在英刊《远东评论》上著文介绍清华学堂，称此时唐国安为“实际的校长”（Eventually President）（Bolt: *The Tsing Hua College, Peking, The Far Eastern Review, February, 1914, P.364*）

就这样，唐国安并未因官卑言轻而退缩，却以自身才识和实干精神，顶住官场等级观念的压力，挑起了“庚款留美”的重担。

二、游美学务处选派的四批留美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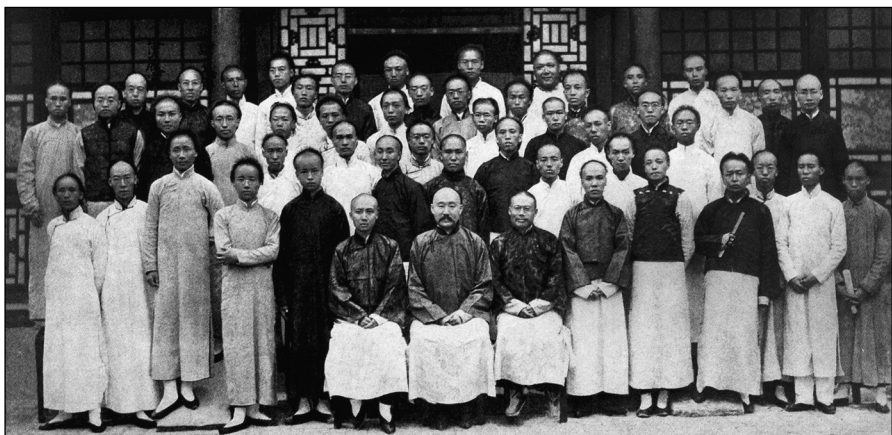
按照协议规定，游美学务处的首要任务是选送学生出国留学，于是向社会公开招生。据1909年9月1日《申报》报道，招生公布后，报名者近千人。9月4日在学部开考，由周自齐、范源濂、唐国安主考，

应试者500人，第一天考经史舆地，第二天考洋文（英文）、算学，9月8日发榜，取68名。9月9日至13日进行复试，考物理、化学、博物、代数、几何、三角、外国古代史、外国近代史、外国地理，初步录50余人。

据9月21日《申报》报载，最后“复试取定名单47人”，日后为大家所熟知的梅贻琦、张子高、唐悦良、金邦正、秉志、何杰、金涛等榜上有名。录取生接到通知后，齐集上海，准备出洋。

这是游美学务处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，由唐国安亲自率领前往。唐国安有游美学习的经历，充当此任自是驾轻就熟。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《中国青年》（英文）杂志曾以《学员得人》为题称：“唐君为美国耶鲁大学高材生，名重中西。此次以身作则，为后学诸生表率，其成绩必更可观。记者爰为政府庆得人也。”（《中国青年》（英），1909年第12期，第256页）

学生会集上海后，唐国安凭借他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，动员上海基督教



1909年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全体与老师合影

青年会协助接待。青年会的同仁们腾出自己的会所作为招待所，让学生居住，并设宴款待。

经过短期准备，10月12日乘蒸汽机轮船“中国”号放洋。

到日本时，在横滨上岸，东京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派出6人先行照料，帮助他们转赴东京再启程赴美。

11月6日抵达旧金山。次日，《旧金山呼声报》（*The San Francisco Call*）星期日版对此进行了报道，大标题是《中国拨出一千一百万美金用于其子弟的教育》，副题是介绍唐国安为领队，称他是耶鲁毕业生，同时登载大幅留学生群体相片、唐国安单人头像。留学生们受到当地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欢迎款待。

11月8日，美国各报如《世界信使早报》（*Morning World Herald*）《爱达荷政治家日报》（*Idaho Daily Statesman*）《圣地亚哥联盟与每日集汇》（*The San Diego Union and Daily Bee*）《阿布魁克晨刊》（*Albuquerque Morning Journal*）等，主要根据“美联社”发布的消息，争先做了突出的报道，产生广泛影响。

这一路行走，得到遍及各地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帮助良多，学生们普遍感到旅途顺利而愉快。他们所走路线正是30多年前容闳带120名幼童出国留学走的路。从上海乘蒸汽机轮船横渡太平洋，先到旧金山，再换乘火车横跨北美大陆，11月13日（农历十月初一）一行人安全抵达华盛顿。此时，容闳和驻美留学监督处监督容揆已在华盛顿车站迎接他们的到来。

抵华盛顿后，再转赴麻省（马萨诸塞州）的春田（斯普林菲尔德）。这地方曾是唐

国安当年留学的故地，办起事来驾轻就熟，而且有驻美使馆参赞容揆的帮助，一切顺风顺水。由于各校都已开学，加之各生情况不一，唐国安和容揆着手对学生进行一次甄别，然后根据每人水平，分别将他们派往各地，或入大学，或进高中（预备学校）。他们还“亲往详细查察”，看到“所有教授管理诸法，均甚相合，诸生亦皆安心向学”，直至安置妥当才回国。然后向外务部和学部报告了此行，外务部、学部将情况“会奏”皇上，获批。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：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（一）》，第131～132页，《外务部会奏第一次遣派学生到美入学情形折》）第一批派遣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学务处工作人员。

此次率生出洋，唐国安还派他的本家侄子、时任游美学务处英文副文案的唐彝（字贻典，号孟伦）协同护送。

有了第一批，就有第二批、第三批。到了第二年，即1910年，第二批招考于7月在学部举行，录取学生70名，8月放洋。由唐孟伦和严智崇、胡敦复三人将赵元任、张彭春、钱崇澍、竺可桢、胡适、庄俊、李锡之等学生70人带往美国留学。8月16日乘船离沪。

第三年，即1911年，第三批招考在清华园举行，选录206名。此时清华学堂已成立，他们应是在校生，但由于当年选送缺额正多，还是照老办法从中甄别选录63名，继续直接保送出国。7月放洋，由谭明甫、钟文鳌二人将姜立夫、陈长蘅、梅光迪、虞振镛、章元善等63人送往美国留学。

同时，遵梁敦彦命，从1911年3月清华学堂录取的第二格（中等科）学生中，

□ 史料一页

甄别录取幼年生胡光廛等 12 名，于 1914 年保送出国读中学。这是由留美学务处直接派出的第四批、也是最后一批留学生。

经第三批甄别后留下的 143 名备取生，全部转入清华学堂，与北京及各地的新生一同入学。

以上这三批大学生加一批中学生，总共 192 名，均是直接保送出国的，史称“直接生”；又因均于录取后又进行过品学甄别，故又称“甄别生”。按冯友兰先生的说法，统可称之为清华“史前期”学生。

为统筹学生的出国事宜和抵美入学及日后管理事宜，游美学务处还下设两个管理机构。

一是在华盛顿设游学生监督处，任容揆为监督。容揆也是容闳带出去的第一批留美幼童，耶鲁大学毕业，时任中国驻美使馆参赞，由他负责学生择校、入学、学习、生活和费用等问题。第一批留学生抵美入

学，他出力不少。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：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（一）》，第 7 页，《外务部递片奏折》）

二是在上海设办事处，任唐元湛为监督。唐元湛是唐国安的同宗兄弟，容闳带出的第三批留美幼童，回国后一直在上海工作，时任上海电报总局局长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。由他负责办理学生的出国签证、购置船票、置装、学习礼仪等准备工作，并发放生活费。（清华大学校史档案）

派遣的成功，使中断了近三十年的留美教育事业得到恢复。正是由于这批早年留美幼童的不懈努力，使享有“留学生之父”声誉的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得到实现和赓续，从此开辟了 20 世纪留美教育的新局面。唐国安因此被誉为容闳事业的传承人，留美教育的承前启后者，20 世纪留美教育新纪元的开拓者。人们在缅怀唐国安、唐元湛、容揆的时候，也不会忘记同样是留美幼童



1910 年第二期留美生与老师合影，内有赵元任、胡适、竺可桢等人

的唐绍仪、梁敦彦、梁诚和周自齐、伍廷芳、颜惠庆等外交家。他们在与美方交涉退还庚款余款用于办学的谈判中，做出过重要贡献。

三、游美肄业馆和清华学堂

在一年一度选派留学生出国的同时，按照原定协议，游美肄业馆也在紧张兴建中。由范源濂代表学部接收咸丰皇帝的五弟惇亲王奕谿的废园——清华园（俗称“小五爷园”）作为校址；招聘长顺等木厂整修工字厅（洋人称它为“衙门”）、兴建“清华学堂”楼、校门、讲堂、斋舍、医院、教职员住宅等；延聘中外教师；招收学生，一部分从各省招，一部分在北京招，一部分为第三批直接生中留待次年出国的学生。

周自齐和唐国安、范源濂一起主持各科考试。还由唐国安单独对考生进行英文考察。据前清华大学历史系、后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崇铨回忆，说到自己当时的感受，“最担心是（笔者）英文程度太差，尤其是考到‘英文默写’，由唐介臣先生读一段英文，考生跟着写录，唐老先生英文太好，念得非常流利，只是苦了笔者跟不上，尤其是每句末来一个Period（句点）。”（刘崇铨：《我对清华的回忆》，载《学府纪闻——国立清华大学》，第276页）

校门（后被称为二校门，有别于扩充后的清华园的西校门），由那桐题写“清华园”三字。那桐时任大学士（1899年）、总理衙门大臣（1900年）；1911年5月8日（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），清廷发布内阁官制，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，那桐已和徐世昌升为协理大臣（相当于内阁副总理）。

各项准备基本就绪，唯原定一年完成的肄业馆一些建设工期，因工人罢工而拖延，开学日期不得不由1911年2月推至3月末。

唐国安十分重视教师在育人上的作用，慎重对待教师的选聘。除聘请博学多识的中文教员十余人外，他还提出聘请一部分外国教员任教，以为学生留美做准备。学堂领导接受他的建议，由他委托世界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穆迪（John R. Mott），按品学兼优标准在美国延聘优秀教师。穆迪与美国一些优秀的教师组织有密切联系。经过缜密细致的选聘，结果共选定外籍教员17人，包括女教员9人、男性教员8人。

他们于1911年2月21日抵达北京。因新建筑尚未竣工，白白等了约6个星期。他们在清华服务多年，为清华的开创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。

1910年底，学务处上奏建馆事宜，拟于次年春季开学。宣统三年三月十一日（1911年4月9日）经御批，正式将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。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：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》（一），第143～145页，《外务部扎奏准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订章开学》）

1911年2月，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迁入清华园。此时，各省保送生已有184名；北京正月考取“第二格”即中等科学生141名（正取生116名，备取生25名）；加上上年留美备取生143名，总共468名，成了清华学堂第一批学生。1911年3月30日（宣统三年三月初一）中等科“暂行开学”。4月1日，高等科开学。4月3日，开始上课。清华学堂宣告成立。周自齐兼任学堂监督，唐国安、范源濂兼任副监督，学生460余人，

□ 史料一页

教师 30 余人。

为什么叫“暂时开学”呢？因为礼堂（同方部）等建筑尚未完工，无会场可容，更主要是将肄业馆改名“清华学堂”尚未得到皇上赐名敕复。当时还许诺“于暑假后再定期举行开学礼式”，但后来辛亥革命爆发，此事不了了之。

由于总办、会办在游美学务处任职均为兼职，本兼之间时有冲突。在学堂开学的紧要时刻，周自齐正忙于随同载振贝勒 6 月赴英参加英皇乔治五世登基典礼。

而此时唐国安却在海外进行“密联美德”外事活动。因负秘密使命，引起各种猜测，有说他去欧美做调查，有说去欧洲考察教育。

学堂开学前夕，外务部特此给驻美公使发去急电，转命唐国安急速回国接应，既是为准备海牙禁烟会，也是为应对当下学堂成立诸事。该电经周自齐、范源濂签发“行”，亦表周、范期以重托之意，电文如下：

“海牙开会禁烟有期，拟派介臣会同办理。学堂开办伊始，子廩（按：周自齐字）不日赴英，尤须接洽一切。可否转饬介臣，先由欧洲回国。”（清华大学校史档案）

唐国安身不由己，最终未能赶回参加他苦心孤诣、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清华学堂的开学。外务部遂任命颜惠庆为清华学堂“代理总办”，6 月至 7 月（每星期去清华园办公两天），和范源濂（后兼教务长）一起主持开学和建校初期的工作。第三批“直接生”63 名赴美留学就是此时派出的。

不久，周自齐和唐国安完成出使任务，返回学堂，针对开学之初的一些现象，着手进行重整，“对于本校挟有一种新计划，

以武汉起义，校事停顿，不克实施”。（《清华略览》，载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》（一），第 27 页）新聘张伯苓为教务长，实行“中五、高三制”，并且招了一届 100 名新生入学。

四、辛亥革命爆发和清华学堂关闭

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爆发，12 月 18 日南北开始议和，1912 年元月 1 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，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，2 月 12 日溥仪退位，3 月 10 日袁世凯当上大总统，3 月 13 日唐绍仪奉命组阁。这一系列的变化，对身为“帝国学堂”的清华学堂冲击极大。

人所尽知，袁世凯从一开始，就不愿将庚款退款用于派遣学生留美，而要用来修路开矿，再用赢利派学生出国留学，现在他成了实际掌权人，反对“庚款留美”的声音又起，“学堂不值得办”甚嚣尘上，学堂岌岌可危。

首先，学堂“断炊”，袁世凯占用经费，拿去发了军饷。再者，相当一部分学生感到前途渺茫而自动离校。于是，在辛亥革命爆发一个月后，11 月 7 日学堂宣布关闭。

冲击更大的则是学堂主要负责人陆续回归仕途，脱离学校。

先是总办周自齐，以“各省人士服官北京者”身份，一度加入北方议和团，“参预议和事宜”（张竞生：《南北议和见闻录》，《张竞生文集》下，第 339 页，广州出版社，1998），会议从 1911 年 12 月 18 日开始，1912 年 3 月 10 日结束；周自齐 1912 年 1 月不再担任清华学堂监督；3 月任山东都督；3 月 13 日入唐绍仪内阁，任交通总长；唐绍仪辞职后，二次组阁，出任财政总长，后任农商部总长。

另一位会办范源濂，也以“各省在京之士”身份，加入北方议和团，随唐绍仪参与南北议和会议（《张竞生文集》下，第342页）。范源濂3月13日入唐绍仪内阁，任教育部次长（总长为蔡元培），二次组阁后任教育部总长。

颜惠庆曾说，周自齐（财政总长）、朱启钤（交通总长），范源濂（教育总长）“这些人多属袁氏故旧”。

学务处代理总办颜惠庆，也于1912年3月13日入唐绍仪内阁，任外交部次长（总长为陆征祥），后出任驻外使节，担任过外交总长，数次兼、代、署理国务总理。

教务长张伯苓已在武昌起义前离京回津办南开。

这期间一些不法分子企图浑水摸鱼，煽动民众，叫嚷洗劫清华园。庶务长唐孟伦代行校务，奋力支撑。他加强警卫，购进枪支装备，将校卫队由12名扩充至24名，日夜巡逻，保卫清华园。《清华周刊》（十周年纪念号）对他这样称许：

“是年（指1911年秋），鼎革事起（指辛亥革命发生），校生分散，京畿动摇，匪徒麇起，而本校独以安全者，先生冷静坐镇，实居其功也。”

唐孟伦自清华学堂成立之日起，出任庶务长，和教务长、斋务长并列“三长”，在校长领导下负责学堂行政事务，历十一年，直至1922年去世。他工作勤奋，为人谦和，对学校行政和校园建设多有贡献，深受职工拥戴，清华华职公会（中国籍职员组成的公会）成立时当选为首任会长（继任会长为梅贻琦）。

对他的去世，全校员工深感痛惜，自发集资，在他办公室旁荷花池畔小山坡上，

为他立起一座纪念碑。该碑由正在清华念书的梁思成设计，由国学大师梁启超勒铭：“清白乃心死厥职，如此人格足矜轼”，并由梁思成画一素描以留念。这是清华园内第一座纪念碑，一座纪念学校行政人员功绩的纪念碑，寄托着人们对学校的行政事务和职工的崇敬和尊重。斗转星移，历尽风霜，纪念碑在“文革”中被推倒掩埋，不知去向何方，只留空座在山坡上。

这时学堂负责人只留下唐国安一人，而他又于1911年12月1日至1912年1月23日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二届万国禁烟会。这次会上制定了世界第一个禁毒条约——《海牙禁毒公约》，这也是清政府最后签订的一项国际公约。唐国安没有就此离去，开完会后依然回到清华园守望，他没有让学堂解散。

随着形势逐步稳定，复校成了唐国安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。他的着眼点一是抓教学，二是抓经费。这是复校必备的基本条件。抓教学，首先要选定一位合适的教务长。清华学堂情况特殊，它一开始就被定位为留美预备学校，既要适应学生毕业后升入美国学校的要求，又要考虑中国学生的实际水平和需要，怎样搞好教学是一大难题，此前有过经验教训。

外交部的周诒春成为首选对象。周曾留学美国，先入耶鲁，后转威斯康星大学，获文学硕士学位，回国后经“洋进士”考试获进士衔，有名望，有经验，有才干，被唐国安看中，是主抓教学的教务长最佳人选。周诒春果不负众望，成了唐国安的主要助手，后又由唐国安选定为接班人。

经费问题因时局变化，一时无着。唐国安屡屡向财政部催要所欠20余万欠款，

□ 史料一页

还请外交部出面催财政部拨还。1912年(民国元年)8月22日呈报外交部:

“惟上年光复以来(按:指辛亥革命),财政困难几有应接不暇之势,本堂(若)未到窘急地步,断不向该户(按:指财政部)催收。今秋季学期已届,而美国聘来之教习,支薪必须应期。全堂上课之学生膳费,不容少缓。重以游美之学费月逾三万金,汇期已过,若再拖延,学生固不免有解散之虞,学堂亦将有停办之势。堂中洋教习十八员若按定合同索取薪金,不特应付为难,且与国体有损。国安焦灼万分,屡从借款着想,四出磋商,乃无一路应手,旁皇无措计,惟有吁恳我总、次长大力维持,咨明财政部将所欠本学堂之款二十余万两,迅予拨发,以济急需,实纫公谊。”(清华大学校史档案)

焦灼之情,跃然纸上。财政部欠款拿不到手,不得已,只得向华比银行、华俄银行和卡利基金借贷,勉强维持复校所需经费和国外留学生学费,艰辛备尝。

在社会大变动中,清华学堂几经曲折,濒死重生,终于在中华民国成立的这一年站立起来,使之享有“寿与国同”的美誉。日后,两块大匾“寿与国同”和“人文日新”,高悬于清华礼堂楼上后壁墙上,传达着创业维艰、继往开来的历史和使命,与礼堂前台墙上高悬的“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”,交相辉映,彰显着熠熠生辉的清华精神。

五、由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

即使条件如此艰难,学堂仍坚持于1912年5月1日,即关闭5个月后,宣布复校,重新开学。清华由满清皇家的学堂转变为民国的学校。唐国安被任命为清华

学堂监督,周诒春为教务长。

复校,绝非简单地重复,既要原地起步,又要放眼长远,打好基础,以利发展。

首先,改变领导体制。

唐国安于民国元年四月初七日(1912年5月17日),以游美学务处名义向外交部、教育部呈报一份“裁撤学务处,归并学堂”的报告,内中写道:

“游美学务处,原为筹办学堂、选送学生而设。今清华学堂业已成立,所有办法,均经次第组织完备。当此经费支绌,自应将本处裁撤。嗣后考送学生,监督报告等事,即归并学堂办理,以一事权,而节糜费。”(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: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》(一),第155—156页)

报告获批准,将原来分头管理的各项职能,如招生和派遣工作原由学务处管、教学工作原由学堂管、留学管理工作原由驻美监督处管、学堂和监督处原又统归学务处管,等等,现在统统集中由清华学堂管理,确立学堂的统一管理体制。

1912年10月17日,唐国安呈请将“清华学堂”正式更名为“清华学校”,以遵照教育部令,适应民国教育体制。经两部批准,任命唐国安为校长,周诒春为副校长,赵国才为教务长。这就是通称“清华校长唐国安”的由来。

其次,修订章程。

由“学堂”改为“学校”,不是仅一字之改,实际涉及深刻内容,如将“中高五三制”改回为“中高四四制”;中等科只招一年级生,高等科在京、沪、汉、穗四地设点招少量插班生。

如前述,清华学堂于1911年2月开学前,已经制定了《清华学堂章程》,规定

学堂“以培植全材，增进国力为宗旨”，“以进德修业，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”；设高等中等两科，学制各为四年。

开学后，是年8月，对章程做了一次修订，仿照当时普通中等学堂的学制，实行中等科五年、高等科三年的新学制，并分年级教学。1912年5月学堂重新开学后一段时期，仍按此修订的章程实行。

为适应民国教育新体制，这一套显然不行了，唐国安于1913年开始主持制定新章程——《北京清华学校近章》。

新章程确定了学校的宗旨和范围：“本校以培植全材，增进国力为宗旨，以造就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受同等之教育为范围。”明确清华学校仍为留美预备学校。

《近章》恢复了高、中两科各四年的学制，加大高等科的力度，充实其教学内容；实行文、理分科教学，设必修和选修两类课程。确定招生办法：从1913年秋起，招收11~13岁的中等科一年级学生。

《近章》还规定了考试办法、升级及游学的条件、学生的体育和卫生要求以及对学生的日常管理、品行培养和自我约束等细则。如考试制度，学校平时有口试，随时进行小考，期末大考，用三种考试成绩的综合（口试和小考合占70%，大考占30%）来评定成绩；成绩总分平均在70分以上，各科分在60分以上才能升级。

该章程在唐国安逝世后，继续得到补充修订，力臻完善，于1914年6月宣布实行。《北京清华学校近章》为清华学校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模式。（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》（一），第159~168页）

第三，落实经费。

清华复校，守成不易。最大、最迫切

的问题莫过于经费来源断绝。为此，他花了整整两年时间，四处奔走，寻求解决。但光应付眼前问题并非长久之计。经费困难的背后隐藏的还是“庚款留美”要不要办下去？这一争论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还在进行，如段祺瑞坚持先用这笔钱办实业，盈利后再派人留学。

要想维持庚款留美教育的继续，关键是要确保清华经费来源不成问题。他巧妙地利用当初中美双方商定的“先赔后退”原则，即上海海关每年将对美赔款划拨给美国花旗银行，然后通过一个手续，再由花旗银行作为美国退款退交中国外交部，外交部再按“专款专用”原则拨给清华，这样不致退款被中途截留，移充他用。他重申此款不应由上海海关直接上缴财政部，也不应直接上缴外交部，而应直拨学校。为此给两部写报告，阐明原委，呼吁循例，以求经费问题妥善解决。民国二年（1913）年七月十四日——此时他已重病在身，唐国安再次向外交部呈报，除继续反映当前学校财政之窘状，还着重申述学校经费之专款专用原则：

“美旗银行要求到期偿还美金三十八万五千元，为数颇巨。”“华比、华俄两银行借款共计公砵平银七万三千两，卡利基借款美金二十万两并各利息（必须偿还）”。“今夏派生赴美川资各费以及本堂暨游美学务经费，经此次派生后尚有游美学务之增加经费。以上种种，或为契约所关，或属事业必行，即应行之，退还之赔款六十余万美金全数到校，窃尚有不敷之虞也。”

“查美邦所退之赔款原备充派游美经费之用，曾经外务部与驻京美使商定有案，

□ 史料一页

其与国家经常收入可以挪移用途者迥然不同。此款之不能绳以普通规则，自在钧部洞察之中。国安为遵照成案，维持与国信用起见，特将美款与本校之关系详细缕陈，如何之处，伏释钧部核办示遵，实为公便。”（清华大学校史档案）

这一问题的重新确认，使学校经费来源——也使得清华学校的存在，得到长久保证。

第四，扩充校园。

唐国安规划学校未来的发展，十分关注校园面积扩大。经过积极交涉，将清华园西侧近春园（废园）和畅春园东南隅（今西院）纳入学校的范围，至此校园面积陡增480亩，由最初450亩，连周边地面加在一起，增至1200亩，为日后学校的发展

预留了空间。

据1914级学生周启邦在1914年《清华年鉴》（英文）中写道，此时为适应发展之需要，已开始计划兴建科学馆、体育馆、图书馆和大礼堂，即后来著名的“四大建筑”，可能在下一学年即行启动。（*The Tsing Hua Annual*, 1914, Vol.1, P.10）

第五，为避免学校因更名而降格，唐国安特地与周诒春副校长联名上书外交部、教育部，要求将学校校长的任命，由“委任”升为“简任”。就唐国安、周诒春个人而言，原本已是外务部参议，这里不存在争个人职级问题，实为提高学校地位打算。

清华学校的基本模式由此形成，直至1928年改制为清华大学。

新中国第一批“洋学生”

——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始末

○陈强 孙奕 王静 钱景斌

第一批来华留学生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国际局势也随着二战的结束而逐步发生变化。以美、苏两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日渐形成并成对抗之势，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孤立、军事敌视的政策。为了迅速打开外交局面，新中国在成立伊始采取了“一边倒”的外交政策，到1949年底，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、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、捷克斯洛伐克、匈牙利、朝鲜、波兰、蒙古、阿尔巴尼亚相继与新中国建立外交



1950年9月，清华大学开设“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”，接受捷克、波兰、匈牙利、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五个东欧国家的33名留学生进入清华大学学习